

10—13 世纪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

■ 芦 敏

公元 10—13 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变动较快,导致人口流动加速,与中国有着悠久经济文化往来的朝鲜半岛成为华人移民海外的重要目的地。由于政权覆亡、赋役沉重、生产条件恶劣、经济文化交往等各种原因,来自渤海、契丹、女真、两宋等地的民众通过营州道、傍海道等东北陆路和登州、明州航线,迁入朝鲜半岛。这些华人移民人数众多,身份构成复杂,共同为朝鲜半岛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民族融合,为以后朝鲜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朝鲜半岛; 华人; 移民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4)01-0129-05

芦 敏, 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信阳 464000)

10—13 世纪,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并立,朝鲜半岛上的华人移民活动随之变得非常活跃。通过翻检文献资料,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华人移民的若干史实,不仅可以推动中韩移民史的深入研究,而且还将对朝鲜半岛的民族融合有更为具体的认识。本文拟从移民历史背景、移民迁移路线、移民活动过程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华人移民构成及其对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贡献。

一、华人移民朝鲜半岛的历史背景

自 10 世纪开始,中国历史陷入长期的分离状况,南北政权相对,时有军事冲突,社会的稳定性被严重削弱,人员流动显得频繁而常态化。朝鲜半岛因与中国东北接壤,先秦以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社会急剧动荡的大环境下,与中国地理邻近且文化相似的朝鲜半岛,自然就成为华人移民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一) 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916 年,契丹正式建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契丹逐渐取得东北亚区域内的霸主地位。926 年,契丹率先攻灭渤海国,然后,继续东扩和南侵,力图在对高丽和对北

宋关系中取得主导权。为了防止高丽和北宋结成联盟,契丹采用军事打击和外交施压的双重手段,屡次迫使丽宋结盟失败。985 年,北宋遣使高丽,寻求军事合作;994 年,高丽遣使北宋求援,均以失败告终。最终,通过“澶渊之盟”和三次大规模对丽战争,契丹正式确立了区域内的霸主地位。

到了 11 世纪晚期,契丹的势力不断下降,中国北方兴起了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女真建立金朝后,发展势头更为强劲,逐渐取代了契丹的霸主地位。1125 年,金出兵灭亡了契丹;1127 年,又灭亡了北宋。随之,金构建起以其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1141 年,金宋两国订立和约,次年金国遣使册封高丽国王,正式完成霸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3 世纪,金和南宋先后被蒙古灭亡。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政局的频繁变动导致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波动,而社会动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员流动的增多和加速。

(二) 多层次的中朝经济往来

契丹、女真、两宋政权皆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保

持着多种形式的经济往来。

第一,贡赐贸易,即封贡活动中进行的官方物品交换。契丹、女真、两宋政权都曾与高丽建立过封贡关系。在册封和朝贡活动中,作为礼仪的一部分,双方需交换大批物品。每逢辽、金及两宋皇帝即位、生辰及正旦、冬至等节日,或高丽新王登基、有事奏宣等,中朝双方都会派遣使团,因此,这种贡赐贸易比较频繁,而且交换的物品也相对贵重,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第二,私觐贸易,即使臣以个人名义与他国君主或官员进行的物品交换。在问礼回答、觥筹交错之余,互赠礼品必不可少,如此便形成了“私觐贸易”。各政权一般都对私觐贸易有明确的规定。出使时,携带的私觐物由朝廷按成例拨支,详细记录沿途馈遗情形,回来后上报朝廷;接待外国使臣时,收到私觐物要及时上报,由朝廷统一处置。

第三,关市和市舶贸易,即官方开放的民间贸易渠道。当契丹、女真与高丽之间关系比较缓和时,双方一般都会开放若干关市,允许民间贸易存在。两宋在沿海设有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登州港和明州港。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大为不同,物品多为日常所需,且交易量巨大,交易活动频繁。

第四,走私贸易,即非法存在的各种贸易活动。例如,使臣借职务之便,私自从事个人交易活动或交易违禁物品等,都属走私之列。而更多的走私活动,则出现在民间。在某些时候,契丹、女真、两宋都曾关闭过对丽贸易通道,但据史籍记载,这时仍然有较多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走私活动。

(三) 深厚的中朝文化渊源

自史前时代开始,中国一直与朝鲜半岛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并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10世纪开始的中朝文化交流,即是在此基础上展开。通过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中朝之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物质文化领域,中国的丝织品、书籍、文具、金银器与高丽的苧布、人参、松子等,在中朝境内自由流通,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在制度文化领域,古中国的礼乐制度、法律制度、科举制度和中央政权建制等,继续传入并完善了朝鲜半岛的制度建设。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朝共同尊奉儒家思想,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交流活动,中

原的诗词、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在高丽广受推崇。

二、华人移民朝鲜半岛的迁移路线

华人移民迁入高丽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其中,契丹、女真治下民众采用陆路迁移,两宋所辖民众则经由海路。

(一) 陆上迁移路线

自中国境内进入朝鲜半岛的陆路主要有营州道和傍海道两条线路。营州道为唐王朝所开辟,此后一直沿用。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也。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1](P1146-1147)以安东都护府为中心,辽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其中向东南方行走即可进入朝鲜半岛。1007年,辽圣宗将营州定为中京之后,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完善。“在高丽境内,是自开京经西京,北至龙州,由此进入辽境内的保州来远城;在辽朝境内,是从来远城经开远城至东京辽阳府;在东京至中京之间辽朝设有专门的驿道,高丽朝贡使团可以凭借这条驿道从辽朝东京而进入中京;再分途去上京或南京。”^[2](P462)

傍海道是沿着海岸线的一条陆路通道。据唐晓峰、黄义军考证,其自辽国的北京出发,经潞县、三河……营州、显州,至辽阳,然后东去朝鲜半岛。^[3](P573)结合《东北古代通史》中的相关内容,概括这条道路即是从北京出发,经平州、迁州,越过榆关至锦州,然后经铁州至辽阳,渡过鸭绿江,抵达平壤。高丽时人金富轼,也曾描述过这条路线:“昔大辽未亡时,辽帝在燕京,则吾人朝聘者,过东京,涉辽水,一两日行至医州,以向燕、蓟。”^[4](P442-443)

以上两条交通路线,是唐以后中国北方与朝鲜半岛之间外交、商贸、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虽然各朝具体路线略有不同,但大致保持了一致。陆路迁移的成本较低,可携带较多的物品,且能承载大量人口,因此成为绝大部分华人移民迁移的主要路线。

(二) 海上迁移路线

海上迁移路线也有两条,即从登州出发的北路航线和从明州出发的南路航线。

北宋前期,华人移民朝鲜半岛采用的是北路航线。这条航线自登州出发,到达八角海口,然后“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

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5](P14040-14041)。移民首先使用这条航线渡海登陆,而后再进行二次迁移,定居朝鲜半岛。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6](卷26),易受契丹攻击,从1071年开始,航线南移。

据出使高丽的徐兢记载:“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使者及随从以二神舟、六客舟发自明州,次日达定海县。二十四日乘东南风离招宝山,次日抵沈家门。二十六日入梅岑候风。二十八日张蓬泛舶入洋,二十九日先后历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六月二日舟舶驶抵夹界山。三日抵黑山,自此起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航,岛屿相属,以迄王城。六日,船至群山岛。八日泊马岛。九日抵唐人岛、大青屿,复至紫燕岛。十日来至急水门。十二日顺礼成江上至礼成港,旋入于碧澜亭。十三日遵陆至于王城。”^[7](卷34至39)可见,这条航线由明州出发,沿海岸北行至淮南东路海面,然后渡海东北行至宋丽两国的分界处夹界山,此后再沿高丽西海岸北上至礼成江口,从碧澜亭登陆。

三、华人移民朝鲜半岛的活动

10—13世纪,华人移民活动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在迁移原因与过程上,差异巨大。

(一) 渤海移民活动

渤海与朝鲜半岛相连,交通便利,两地很早就有了密切的商贸、文化往来,彼此民众亦相互了解。926年,渤海被契丹灭亡后,相当一部分民众迁往朝鲜半岛。这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半岛与渤海的地理和文化距离较近;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政权覆亡,民众不愿受制于契丹。

渤海民众迁入朝鲜半岛的移民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契丹初至景宗、圣宗至契丹末。在第一个阶段内,众多贵族、官僚、平民涌入朝鲜半岛。其中,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三次。934年,渤海亡国后不久,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数万人投归高丽^[8](史部159,P62);938年,又有3000户迁入高丽^[8](史部159,P65);979年,契丹与北宋酣战,无暇顾及辽东,趁此时机,数万名渤海人迁入朝鲜半岛^[8](史部159,P75)。第二个阶段的移民活动主要是由大延琳反抗契丹引起的。辽圣宗统治后期,渤海民的生存环境恶化。“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糶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

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9](P926)当燕地遭遇饥荒时,契丹还命渤海民习熟航海者,载运辽东粟米赈济燕民,不少渤海人因此丧命,对契丹更是怨声载道。于是,大延琳趁机而起,建兴辽国。次年,契丹平息了战乱。受这次战争的影响,一大批渤海民迁入朝鲜半岛。

(二) 契丹移民活动

契丹移民多为社会下层民众。承平时,他们需要负担各种税赋;战争期间,他们需要倾全家之力支持军队,故而,其生活常常陷入困顿。契丹的对外战争很多,为了应付战争,常需举国投入。然而,“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穀,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真、高丽合纵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9](P1446)。到了11世纪初,频繁的移民活动就出现了。

契丹民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向南,只有少部分迁到了朝鲜半岛。据《高丽史》统计,契丹共有55批移民迁入高丽,约有2020人。从记载来看,迁入朝鲜半岛的契丹移民主要出现在第三次辽丽战争期间及以后。仅1016—1018年间,就有21批移民抵达高丽,多者数百人,少者数人。这种现象大概持续到1033年,此后移民事例就比较稀疏了。虽然契丹民的迁移活动频繁,但人数较少,难以找到超过千人的移民事例,平均每批次仅有37人。^[10]

(三) 女真移民活动

女真的移民活动绝大部分发生于其建立金朝之前。彼时,女真各部林立,依附于周边大国。为了改善生存环境,许多部落向高丽朝贡以维持日常经济生活,或选择迁入朝鲜半岛定居。金朝兴起之后,随着国势的强盛和疆域向南方农耕区的扩展,女真民众占有的自然资源增多,能够从事更多的生产活动,定居的趋势增强,人口流动性便开始减弱。

女真移民朝鲜半岛的历史可追溯到921年,当年共有370人迁入。不过,11世纪初之后的一百年间才是女真移民活动的频繁期。从1017年开始,连续的移民事例出现,少则数人,多则数千。1028年,骨夫率部落500户投

归高丽, 唵拔率其族300户投归。^{[8](史部159, P120-122)}1031年, 女真将军阿豆间等340户投归。^{[8](史部159, P126)}1047年, 东女真蒙罗等村古无诸等312户投归。^{[8](史部159, P155)}1104年, 东女真男女1753人投归高丽。^{[8](史部159, P250)}1107年, 东女真袅乙乃等3230人投归高丽。^{[8](史部159, P263)}除了这些大规模移民外, 人数低于千人的移民活动还有许多。

(四) 两宋移民活动

两宋与朝鲜半岛远隔海洋, 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少有, 一般是因为经济文化交往而产生移民行为。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联系非常紧密, 宋商不仅掌控着宋丽海上贸易, 而且还受到高丽王室的倚重。在文献记载中, 能够留下姓名的宋商就有109人, 其中郭满、林宁往返5次, 徐德荣、陈诚往返4次, 林庆、林大有往返3次。^{[11](P107)}繁忙的商业往来使许多宋商留居高丽, 仅王城开京就聚集了数百华人^{[12](P2560)}, 其中多为商人移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官员、文士等因为文化信仰迁入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民族文化构建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是其最重要的来源, 因此, 两宋与高丽文化相近, 高丽人对宋文化相当仰慕。当官员和文士遭遇政局动荡或倍感怀才不遇、想要迁移海外时, 环顾周边, 朝鲜半岛将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若干年前, 圣人孔子就率先发出了欲居九夷之说。池宗海、吴仁裕、陈琇、夏钦等官员, 以及周佇、刘载、戴翼、欧阳微、林光、胡宗旦、张廷、卢寅、陈渭、章忱等文士, 纷纷投归高丽。

四、华人移民的构成及其对朝鲜半岛发展的历史贡献

10—13世纪, 大量华人移民迁入朝鲜半岛。他们的身份构成比较复杂, 有贵族、官员、文士、商人, 也有普通百姓。这些华人移民各尽其能,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 为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贵族、官员

迁入朝鲜半岛的贵族来自渤海和两宋。渤海都城沦陷后, 世子大光显率数万人投归高丽。随后, 王族大儒范等人又投归高丽。宋初, 由于皇位继承问题, 太祖长子魏王德昭第三子赵之遴、次子岐王德芳之子赵天赫避乱东渡高丽。

官员移民主要有渤海国工部卿吴兴和大福谟、礼部卿大和钧与大均老、左右卫将军大审理, 仕辽的渤海人

大道李卿、大道行郎、高真祥、王光禄、李南松、大坚济等; 契丹殿直高善悟、殿前高真成、左厢都指挥使大光、保州怀化军事判官崔运符、注簿刘信思等; 北宋大学士池宗海和吴仁裕、兵部尚书杜庆宁、右尹陈琇、吏部尚书牟庆和鞠樛、大将军蒋璿、员外郎郑臣保, 南宋翰林学士宾于光等。

贵族和官员移民数量很少, 但他们身处社会顶层, 受过良好的教育, 掌控着不少稀缺资源。在高丽王朝的倚重下, 他们发挥政治优势, 积极投身于高丽的国家建设, 为高丽的政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例如, 宋朝学士吴仁裕东渡高丽后, 奏请并直接主持了高丽五庙、社稷、国子监的创建。^{[13](P290)}双翼将科举制度引入高丽, 仿照宋制, 开设进士科与医、卜、地理、律、书、算等科, 使科举制度成为此后朝鲜半岛最重要的选人方式, 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8](史部161, P401)}

(二) 文士

高丽王朝仰慕中华文明, 故而对受过儒家教育的文士相当欢迎, “敦请留止且加职秩以劝来者”^{[8](史部159, P223)}。在此招徕之下, 契丹乡贡进士李运衡与两宋进士张廷、卢寅、陈渭、章忱, 还有周佇、萧鼎、萧迁、叶盛、慎修、田盛、刘载、邵珪、陆廷俊、刘伋、林光、朱潜等众多无功名之人, 纷纷迁入高丽。

这些文士本身就饱读诗书, 遇到高丽朝廷提供的机遇时, 能量自然迸发出来。慎修父子、周佇、刘载、胡宗旦、章忱、林光等人, 有学识, 善书札, 被高丽委以官职, 负责起草了很多重要的政府文书。卢寅、戴翼、张廷、陈渭等人, 精于诗文, 被授予秘书校书郎, 专掌校勘典籍。孔子门人宾牟贾后裔宾于光、朱熹曾孙朱潜等携带大量珍贵图书东渡高丽, 在当地授徒讲学, 推广儒学教育。

(三) 商人

高丽与契丹、女真、两宋的贸易往来频繁, 华商经常出入高丽, 并受到高丽王室的青睐。华商在高丽主要从事东北亚区域内的进出口贸易, 一是契丹、女真、两宋与高丽之间的双边贸易, 二是以高丽为据点的对日本列岛的转口贸易。在华商的悉心经营下, 高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 一跃而成为东北亚区域内最重要的贸易目的地之一。

除了商业活动, 华商还在外交领域发挥了积极作

用。1068年,江淮发运使罗拯委派宋商黄慎传递神宗旨意:“高丽古称君子之国,自祖宗之世,输款甚勤,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8](史部 159, P187)黄慎圆满完成了丽宋政府间的沟通任务。到了南宋,商人更为经常地充当官方交往的使者,传递各种牒文。《宝庆四明志》提到:“本府与其(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14](卷 6)

(四) 平民

平民是移民的主体,数量最为巨大,主要是通过陆路迁入朝鲜半岛的渤海、契丹、女真民众。对于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高丽政府通常采取特别安置的方式。1073年,女真三山、大兰、支栳等 11 村请求内附,高丽着有司奏定州名,且赐朱记。^[8](史部 159, P194)一般来讲,平民多被安置在南界州县,且单独列为归顺州。居住于此地的移民,“与国家有着特定的役属关系,带有集团的世袭的义务”^[15]。虽然他们的地位不及高丽本土居民,但是所承担的生产活动却很多。

一方面,他们要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1219年,攻陷江东城后,高丽将军赵冲将契丹俘虏分送各道州县,使之聚居,“量给土田,业农为民”^[16](卷 15)。大量移民的迁入,为高丽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增加了土地垦辟数量,并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朝鲜半岛边远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移民还要承担当地的金、银、铜、铁、瓷器、砖瓦、墨、纸、绢、丝、茶、盐等各种物品的生产、贡纳义务。他们不仅在这些手工业活动中出力,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据史籍记载,“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7](卷 19)。在代表高丽手工业最高水平的王室手工业部门中,华人移民的贡献巨大,使高丽的手工业逐步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丝织业中,契丹人引入了高超的丝织技术,最终使不善蚕桑的高丽改变为以织造精致文罗著称的国家。

五、余论

当“两个民族各自丧失部分特征,获得部分新特征”^[17]时,新的民族就会形成。10—13 世纪,来自中国的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等华人移民大量迁入朝鲜半岛,逐渐与当地的高丽族发生融合。由于高丽族在朝鲜半岛占绝对优势,因此,华人移民首先融合于高丽族。然

而,在此过程中,华人移民也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带入高丽族,并使其接受了外来影响。在统一国家内部,众多外来民族与本土民族密切融合,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政治制度使这些民族在融合中形成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认同,为后来朝鲜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3] 唐晓峰,黄义军.历史地理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4]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 [5]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A].天禄琳琅丛书[C].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
- [8] (高丽)郑麟趾.高丽史[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C].济南:齐鲁书社,1996.
- [9] (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芦敏.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4).
- [11] 芦敏.宋丽海上贸易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
- [1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13] 牟元珪.高丽时期的中国“投化人”[A].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4] (宋)胡榘,罗濬.(宝庆)四明志[M].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 [15] 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J].吉林大学学报,2007,(3).
- [16] 金宗瑞.高丽史节要[M].首尔: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3.
- [17] 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J].史学集刊,2003,(1).

【责任编辑:王立霞】